

黄牛县令和悬鱼太守

周 强

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 (第八季) 大型征文

唐代诗人李翰的《蒙求》是中国历史上儿童启蒙读物的经典之作，全书采用四言韵文形式，两两对偶，各自讲述一个历史故事。《蒙求》涉及典故592个，其中“时苗留犊”与“羊续悬鱼”相对，将两位东汉廉吏的典故并列少年儿童的学习榜样。

黄牛县令

时苗籍陕西，自幼随父亲迁居居鹿郡陶唐县(今河北平乡县)，以种田为生。当地一位退休官员张璧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因家无子女，故而对邻家孩子视如己出，经常给他们讲故事、传知识。因时苗聪颖好学，深受张璧偏爱，在征得时苗父母同意后，张璧常将时苗留在自己家中“开小灶”，不仅教时苗识字、读书，还向他讲授治国安邦的道理。时苗对待张璧夫妇犹如侍奉祖父母，十分殷勤周到。后来，经张璧推荐，时苗先后入县学、郡学读书，郡守还准备推荐他到京城太学深造，但时苗考虑恩师垂眷、父母年迈，于是婉辞了太学深造的机会，回到家乡尽孝，照顾恩师与父母。

公元211年，年已不惑的时苗通过“举孝廉”入仕，来到当时的东汉都城许昌(今河南许昌市)，成为曹操丞相府的官员。曹操亦为举孝廉出身，因此对时苗颇为信任。3年后，时苗受任寿春县令，治所就在今安徽寿县县城。时苗套上自家的黄牛，拉上夫人和行李便赴寿春县上任。在县令任上，时苗个性鲜明，

传说有一位里正仗着背后有郡太守撑腰，为非作歹，强抢民女，时苗不畏权贵，依法将其严惩，为民申冤。

时苗对老百姓则是另一种态度。当时适逢汉末战乱，寿春饱受军阀混战和淮河水患的双重侵袭，青壮劳力或被强征入伍，或逃亡在外，留在家乡的多为老弱孤幼。发展生产缺少劳力与牲畜，时苗便把自家老黄牛拴在县衙门口，老百姓只要和守门衙役打招呼，便可无偿使用。久而久之，百姓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黄牛县令”。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时，引用《魏略》记载了时苗留犊的故事。因时苗治理寿春县政绩突出，一年多后被上级提拔担任京城太官令，负责宫廷膳食事务，“为令数岁，不肃而治”。此时他家的黄牛已生下一头小牛，离开寿春前，时苗执意要将牛犊留在寿春，他对寿春县主簿说：“我来的时候还没有这头牛犊，牛犊是在淮南所生，我不能带走。”县吏们都道：“六畜不识字，牛犊自然应当随从母牛。”时苗不听，坚持将小牛犊“留之而去”。寿春老百姓深受感动，“父老攀辕卧辙”，不忍放行，“时苗留犊”的故事也由此名闻天下。

汉魏嬗代后，时苗迁任典农中郎将，相当于较大区域的农业行政长官，70多岁时在任上病故。

悬鱼太守

羊续，字兴祖，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市)人，活动年代比时苗早数十年。羊续出身世家大族，从七世祖开始在朝廷担任高官，因此羊续得以“以忠臣子孙拜郎中”，出任尚书府属官。察武任大将军执政时，羊续担任察武府掾，后因故免职。察武诛谋宦官失败被害，第

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羊续受到牵连，被禁锢十余年。中平二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党禁解除，羊续先担任太尉杨赐府掾，后又升迁为庐江郡太守，当时庐江郡治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

在庐江太守任上，羊续的主要政绩是平定境内的黄巾起义。中平二年(185年)，扬州境内出现黄巾余部，羊续征募县中20岁以上男子入伍，均发放兵器参战；幼弱瘦小者则负责挑水灭火等后勤事务。羊续聚集的武装力量有数万之众，他指挥这支官民结合的队伍并力作战，很快使境内局面安定下来。

不久，邻近的九江郡安风县(今安徽霍邱县)也出现黄巾余部，羊续主动出兵配合作战，恩威兼施，瓦解了对方武装，还发放耕作器具，动员起义士兵回归农业生产。羊续在庐江太守任上任职两年多，因南阳地区发生动乱，朝廷于中平三年(186年)将他调任南阳太守。羊续不负朝廷所望，配合荆州刺史迅速平息了动乱。

《后汉书·羊续传》记载，境内安定后，羊续“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欢服”。当时权贵之家崇尚奢靡，羊续深恶痛绝，常穿破衣、食素食，乘坐老马破车外出巡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大意是：属吏见羊续“敝衣薄食”，便送他一条鲜鱼改善伙食，羊续接受后却将鱼悬挂于庭中；府丞不久又来送鱼，羊续指着悬挂的鱼示意，使其打消了送礼的念头。后来，汉灵帝先后欲任命羊续为太尉、太常，均因羊续无钱打点送礼而作罢。最终，羊续于中平六年(189年)在南阳太守任上病逝，在民间留下“悬鱼太守”的佳话。

影响深远

时苗留犊和羊续悬鱼的故事虽发生在1800多年前，但在后世影响深远。他们清白正直、廉洁奉公的形象深受老百姓爱戴，成为清官廉吏的标杆，文人们也不惜笔墨加以颂扬推崇。

继李翰的《蒙求》之后，明代教育家萧良有又将这两个故事并列编入另一部儿童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仅将次序颠倒为“悬鱼羊续，留犊时苗”。“龙文”指千里马，见鞭影便会自觉驰骋，作者将这些历史人物作为激励学习的榜样，期望少年儿童通过阅读学习，自觉向“千里马”般的优秀人才方向努力。

元代著名画家钱选与赵孟頫均有《时苗留犊图》传世，清乾隆皇帝为两幅画作均作有题跋。题钱选图的诗句云：“为令治一县，去官借众村。犊留表已洁，存纸置他冤。”后两句意为时苗留犊彰显了品性高洁，却也造成老牛与牛犊分离之冤；题赵孟頫图的诗句云：“绘事由来贵可传，时苗留犊足称贤。”

时苗留给寿春的牛犊、羊续在南阳悬挂的干鱼，不仅是实物见证，更承载着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廉为官、清白做人的崇高品德，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纪念。淮南老百姓为纪念时苗，特意将小牛犊曾经饮水的池塘命名为“饮犊池”；明代寿州知州赵宗在池北建祠祭祀时苗，人称“时公祠”，饮犊池与时公祠之间的街巷也因此得名“留犊祠巷”。南阳知府衙门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内宅三堂门口悬挂一条木雕大鲤鱼，用以纪念羊续。如今，寿县留犊祠巷和南阳知府衙门均已成为本地廉政教育基地和外地游客的观光打卡地。

楚文化大家谈 (第三季)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寿县，楚国最后的都城，楚文化最后的积淀之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楚都寿春到淮南国都，从屈、宋楚辞到刘安汉赋，从《招魂》到《招隐士》……千年文脉于此流转，楚汉文化承变的隐秘路径或可窥见。

从楚辞《招魂》到汉赋《招隐士》

兼谈宋玉的寿春行迹

高峰

屈原与宋玉，是楚辞文学的双峰，后世并称“屈宋”。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他以瑰丽的想象与深沉的忧患，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等不朽篇章，更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气节，为楚文化注入了坚毅不屈、执着求索的精神品格。宋玉是楚辞的继承者与转型者。作为屈原的后学，他继承了楚辞的文体与辞采，其《九辩》首开“悲秋”主题，推动了“楚辞”向“汉赋”的过渡。

公元前278年，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大约37年后，即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迁都寿春。屈原与晚期的楚都寿春失之交臂。

那么，宋玉到过寿春吗？最早提供宋玉与寿春关联线索的是《汉书·地理志》：“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

宋玉的生平行迹，因史料匮乏而扑朔迷离。最经典的记载当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根据宋玉主要活动时期推定，楚都从陈(今河南淮阳)迁至寿春时，宋玉已值晚年。宋玉曾任“楚大夫”(或为文学侍从)，有可能跟随楚王室一同迁徙。

关注宋玉晚年活动，尤其是其是否到过寿春，有助于梳理楚文化从江汉地区东进江淮的历史脉络。

二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写下“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的句子。在他笔下，除了楚国曾经的繁华之地阳城，还有东南方向的下蔡。

下蔡原为蔡国故地，公元前493年蔡昭侯迁都于此，始称下蔡。公元前447年楚灭蔡后，下蔡属楚。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年)迁都寿春。“下蔡”与“寿春”地域邻近、文脉相承。

近年的考古研究证实，州来、下蔡的地望均在今寿县及周边地区。依笔者之见，宋玉的“迷下蔡”表面上是以“下蔡”代指楚地繁华城邑。但在考烈王迁都后，寿春实际上取代了下蔡的政治中心地位，文人或沿用旧称指代新都。因此，宋玉笔下的“下蔡”很可能暗指寿春。

光绪《寿州志》载：“哀公二年，蔡迁于州来……则以州来为下蔡”。地名的混用，恰说明寿春作为楚国新都，吸纳了“下蔡”的历史记忆。

关于《招魂》作者，历来有屈原作与宋玉作两说。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招魂》为宋玉招楚考烈王魂而作。公元前238年，寿春城发生的楚考烈王去世、春申君被刺杀的事件，若宋玉其时在寿春，或深受刺激，其作《招魂》以寄托哀思与忧愤。《招魂》在哀婉的气氛中，反复呼唤“魂兮归来”，描述四方上下皆险恶不可留，流浪的灵魂一定要回到“故居”。作品充满想象与夸饰，但应有其现实参照。宋玉在寿春所见的楚王宫室，极有可能成为其笔下华丽“故居”的原型之一。

《招魂》中“紫贝阙兮朱宫”“网户朱缀”的奢华描绘，与寿春等地出土的楚国错金青铜器、彩绘漆器的艺术风格有相通之处；而“稻粱稊麦”的饮食描写，更贴近淮河流域，尤其是寿春境内芍陂(安丰塘)灌溉区可能存在的稻麦种植特点，与江汉平原的稻作农业有所区别。

据此，当代学者刘刚等人通过考证认为，《招魂》的招魂地点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寿春”；招魂对象是楚考烈王；写作时间在“考烈王迁都寿春(公元前241年)之后”。

三

“绍《楚辞》之余韵，开汉赋之先声。”宋玉之后不到百年，被誉为汉代楚辞体压卷之作的淮南小山《招隐士》问世。此篇收入《楚辞》，作者为淮南王刘安门客，托名“淮南小山”。

淮南国都寿春，地处战国故楚核心区域。刘安本人对楚辞有精深研究，曾为《离骚》作注(注文已佚)。因此，淮南王府的文学创作深受楚辞影响。《招隐士》在句式、词汇、意象和抒情风格上，都明显继承了以《九歌》《招魂》为代表的楚辞传统。

《招隐士》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挚的情感，描绘了幽深险恶的山林环境，表达了对隐士的关切与召唤。诗中化用《楚辞》词汇与句式，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等，既保留了《楚辞》的韵味，又体现了向汉赋过渡的迹象。

宋玉《招魂》以“四方上下”的宇宙空间框架召唤亡魂。淮南小山《招隐士》则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巖嶮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山林幽深空间召唤隐者，二者皆通过极致的空间铺陈来实现“召唤”主题。《招魂》“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与《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皆用“兮”字句，从空间建构到句式运用，可见《招隐士》对《招魂》的承袭与变化。

《招魂》“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的香草意象，在《招隐士》中转化为“偃蹇连蜷兮枝相缭”的桂树形象，同属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

宋玉《招魂》表面为君王招魂，或蕴含招复楚国国运之深意；刘安门客所作《招隐士》表面招隐士，或亦寄托了某种政治企慕与焦虑。二者皆借“召唤”形式表达深层的时代关切，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揭示了从楚都寿春到淮南王国，对楚辞精神的有意承续。

《招隐士》通过对《招魂》模式的借鉴与重构，完成了在寿春这片土地上对楚辞文学的传承。一是下蔡与寿春在地理文化上的叠合与延续。二是从楚考烈王迁都(前241年)到刘安封为淮南王(前164年)，宋玉的创作与刘安及其门客的辞赋活动，在寿春构成了跨越时间的文脉联系。

四

宋玉晚年(约六十岁后)正逢楚国迁都寿春时期，他作为楚国官员(曾任大夫等职)或宫廷文人，随王室迁徙是可能的。

学者周强在《宋玉的安徽行踪》中引述刘刚《宋玉年世行迹考》的观点认为，宋玉“历事楚襄王、考烈王两朝，并随楚都之迁徙，历经陈郢、钜阳、寿春等地。公元前237年(楚幽王元年)时失职，后赋闲于寿春一带十有余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灭楚时，曾避兵乱入古衡山，后又涉江南迁”。学者金荣权《宋玉主要作品创作时地考》认为，“宋玉主要生活在楚襄王和考烈王时代……而这一时期，楚国的都城已迁到了淮河流域的陈城(今河南淮阳)和寿春一带”；“当楚襄王迁都陈城之后，宋玉也随他来到了北方的淮河流域，并在淮阳和寿县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宋玉的主要辞赋作品大都创作于今天的河南淮阳和安徽寿县一带”。

有学者指出，宋玉作品中出现的“巫山”“高唐”“云梦”等地名，主要证明他熟悉楚国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地理，而不能直接作为其亲临现场的证据。然而，其中涉及的“下蔡”等地名，或能反映其实际行迹或对东部地区的关注。宋玉若非对下蔡(寿春)地区有所了解，难以在作品中如此自然地运用。同时，寿春作为楚国最后都城，作为楚辞大家宋玉晚年的潜在活动背景，值得纳入研究视野。

我们有理由推测，楚国走向衰微，迁都寿春时，承继屈原衣钵的宋玉，可能已值晚年，他或许亲身经历了这场国都的最后迁徙。

因此，虽然目前尚无确凿的文献铁证，但通过文本内证、考古发现与历史情境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测宋玉晚年可能随楚室东迁。这位“悲秋之祖”在寿春的黄昏中，或曾立于淮水之滨，将故国的忧思化作《招魂》的哀婉篇章。其行迹的模糊，恰是楚文化在秦汉大一统进程中逐渐融入历史长河的缩影，而寿春城头的明月，仍映照着楚辞最后的瑰丽光华。

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迷下蔡”的书写，到《招魂》的创作，再到汉代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展现了“楚辞”向“汉赋”过渡的轨迹，是楚汉文化一脉相承的体现。因此，“迷下蔡”的文学意象与《招隐士》的文本回归，或可成为探究宋玉与寿春关联的重要线索。前者暗示了地理空间的关联，后者体现了文化精神的延续。正如考古学者所言，楚国东进，经营江淮，楚文化对安徽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楚文化考古的内涵，也包括对其后续影响的探寻。

从《招魂》到《招隐士》，展现了从战国楚辞到汉代辞赋在寿春地区的文脉流转，是楚文化在江淮大地上的悠远回响。



雁起芦荡

杨祥旺 摄

寿州香草

赵 阳

在古城，要说最具当地性格特征的植物，首推寿州香草。

寿州香草是两年生草本植物，茎圆中空，高一米左右，叶对生，花柄长，形似芝麻粒。每年9月种下，次年4月端午前收割，目前仅在古城报恩寺后的香草园内有近百亩种植。香草园四周用花墙隔离，粉墙黛瓦；外面是声名远播的香草小镇，游客如织。园内修有步道，供游人观光、附近居民散步休憩。田园作物一年两季，香草收割后种植葵花。我的家在箭道巷内，距香草园不过400米之遥，因此，香草园成了我每日早晚健身遛弯的最佳去处。

万物皆有灵，苗木花草概莫能外。寿州香草之所以冠以“寿州”域名，概因地方志记载其“惟郢都古城才能生长”，清人李兆洛也记载：“惟报恩寺后产之。”有动了怜爱之心的游人偏偏不信，将它移出古城，栽到别处园圃或花盆中，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它立刻失了风骨——空灵的茎变得滞涩实心，馥郁的香气也杳无踪迹。10年前，当地农业技术部门鉴于寿州香草系濒危物种，专门在距古城南约30公里处开辟种植实验基地，邀请省内著名专家加盟攻关，开展香草保护性繁殖研究。期间，日本、法国的专家也前来观摩考察，并携种回去试种。结果表明，寿州香草确如志书所述，无法异地种植。

之所以又称“离香(乡)草”，还有一个说法：寿州香草是一种讲求“距离”的香。如今，走在香草小镇香

气萦绕的街道上，两边摊位的各色香草制品琳琅满目，显著位置都摆放着一束束用红线扎起的烘干香草。若探过头凑近，鼻尖几乎触到秸秆叶片，反倒嗅不到一丝气味；可当你抬起头，脸前似有清风拂过，一股幽渺、清冽的香气，像一条冰凉的小蛇“倏地”钻入肺腑，缠绕不去。这香气，似无却有、似淡却浓，仿佛不是人间俗物——绝不能亲密把玩，只能远远缅怀。

“离香草”的妙处，不亲身感受，难以体会。乡亲们给它起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

寿州香草，讲求距离、秉持自我，不曲意逢迎、不攀附权势，哪怕被世俗淹没，也绝不改变本色。这哪里是草木的习性？分明是楚人的情肠！那些去国怀乡的游子，不也如此吗？一旦到了举目无亲的异乡，夜深人静时，故园的一草一木、亲人的一言一笑，便像一丝一缕从心底渗出，愈来愈清晰、愈来愈醇厚，搅得人肝肠寸断。这香草，莫非也通了人性，将万千楚民离散的哀愁，都化作这愈透离乡的魂魄？

史书载，王翦灭楚时“尸血成河”。这地下，埋藏着多少具曾温热的躯体？那段岁月，又添了多少个破碎的家庭？我能记得，寿州香草那空空的茎秆，便是那些将士被抽去生命后的躯壳；而那奇异的香味，便是他们不散的忠魂凝结而成。他们在这片土地生，在这片土地死，精魂也固守于此，年复一年生长开来，化作香草绵

绵不绝的思念。端午时节那最为芬芳的气息，或许正是他们相约故都，在无声中举行的一场盛大而悲壮的祭奠。

寿州古城，也因此成为全国端午习俗集中分布区，安徽省仅此一处。

小时候，我不懂母亲为何每逢端午节，都要在我们身上系个香囊。直到初中毕业，从乡村来到寿州古城读书，才明白这香囊不单有“避邪驱瘟”的功用，更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无言教育。香囊的原料是寿州香草，素净且缜有“寿”字的，就在老人的、红绿缤纷的，是给姑娘媳妇的；给孩子的花色更多、色彩斑斓，有瓜果形、鸟兽形、娃娃形，还有各种神话人物形。香囊挂在孩子们胸前，他们跑动起来，便洒下一路幽香。这香味萦绕在孩童鼻端，让孩子记住这片土地的味道；而香囊的形状与颜色，则是孩童关于美与传承的最初启蒙。一代代寿州人，就在这香囊的氤氲里慢慢长大；楚人的风骨、代代楚人对故土的切肤深情，也如这香气一般，悄无声息地沁入骨血。

天下之大，端午习俗何其多——赛龙舟、炸鬼腿、吃粽子，何处没有？但将一种草木的魂魄与一段亡国的痛史紧密缠绕，将一份离乡的哀愁化作愈疗愈秀的执念，再融入民俗、代代相传如生命血脉的，恐怕只有这寿春故地了。这里的端午，不只是纪念一位投江的诗人，更是祭奠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楚国将士；不只是迎接一个时令节气，更是重温一个民族不能磨灭的记忆！